



林语堂传—— 中国文化重生之道

钱锁桥 著

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

Qian Suoqiao

海外学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 Qian Suoqiao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

钱锁桥 著

LIN YUTANG ZHUAN: ZHONGGUO WENHUA CHONGSHENG ZHI DAO

出品人：刘春荣
责任编辑：王辰旭
助理编辑：王倩云
责任技编：郭 鹏
装帧设计：彭振威
内文制作：陈基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 / 钱锁桥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598-1345-9

I. ①林… II. ①钱… III. ①林语堂（1895-1976）—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455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 邮政编码：410000）

开本：720 mm × 1 000 mm 1/16

印张：29.25 字数：350 千字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册 定价：8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成
为
更
好
的
人

目 录

第一章 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知识思想遗产 / 001

纪念林语堂 / 001

反思鲁迅遗产 / 006

我们要鲁迅还是胡适 / 009

林语堂：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与世界 / 016

第二章 基督教熏陶与西式教育 / 029

牧师的儿子 / 029

最杰出的“圣约翰人” / 035

上北京遭遇“文化反差” / 042

从哈佛到莱比锡 / 048

第三章 “大革命”时代民族主义情怀 / 059

科学与国学 / 060

泰戈尔与印度 / 071

“费厄泼赖”还是“痛打落水狗” / 077

萨天师语录 / 082

第四章 从“小评论家”到“幽默大师” / 091

“小评论家” / 092

幽默作为社会批评 / 099

幽默作为自我释放 / 115

第五章 一个人在黑暗中吹口哨 / 127

与鲁迅的友谊 / 128

平社一员 / 139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 147

暗中放冷箭 / 159

第六章 “我的中国”：东方向西方倾谈 / 165

与赛珍珠和华尔希结缘 / 165

《吾国与吾民》 / 171

第七章 “中国哲学家”的诞生 / 189

去美国 / 189

《生活的艺术》/ 198

第八章 阐释中国为抗战发声 / 215

战时中国前线报道 / 218

“新中国的诞生” / 234

战时女杰 / 241

第九章 东方智慧与世界和平 / 251

种族与帝国：印度问题 / 255

“革命外交” / 262

东方智慧与现代病 / 268

与华尔希夫妇的友谊 / 280

第十章 中国的内战与美国的智慧 / 291

《枕戈待旦》/ 291

打字机、苏东坡和《唐人街一家》/ 305

美国的智慧与美国的愚蠢 / 323

美国式友谊 / 331

第十一章 瞭望远景 / 347

《远景》/ 347

南洋大学风波 / 355

重新发现耶稣 / 364

第十二章 我话说完了，走了 / 369

回“家”定居台湾 / 369

共建人类精神家园 / 379

我走了 / 393

附录 林语堂全集书目 / 403

后记 / 459

第一章

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知识思想遗产

纪念林语堂

2012年5月1日新华网报道，福建省漳州市计划投资一亿九千万元兴建“林语堂文化园”。文化园位于林语堂故乡漳州市芗城区五里沙村，占地一千亩，包括已兴建的林语堂纪念馆及周边蕉林区域。预计三到五年建成后，将成为一个林语堂主题文化旅游景点，主要有林语堂纪念馆、林氏父母合葬墓、林语堂祖祠，以及其他娱乐设施。¹

同年10月，另一则新闻报道更加吸引媒体眼球：同样位于漳州市的林语堂家乡平和县坂仔镇计划投资三十亿元兴建“林语堂文化博览园”，要把整个镇建成像莎士比亚故居斯特拉特福那样的“世界级文学小镇”。由于中国人对“家乡 / 故乡”的不同理解，林语堂有两个“故

1 参见《福建漳州兴建林语堂文化园》，新华网，2012年5月1日。

里”：芗城区的五里沙村是林语堂的祖籍地，其父母葬于此，现在有（远房）亲戚仍居住于此。平和县坂仔镇则是林语堂出生地，十岁之前（1895—1905）他在此度过童年。为了争抢文化资源，像福建漳州这样两个地方同时兴建林语堂纪念性工程的例子，在当今中国并不少见。据报道，林语堂世界文学小镇总占地三千亩，前期进行了一千五百亩的规划，主要包括林语堂故居、林语堂文化馆、民俗文化广场、林语花溪大酒店、天地文泉、闽南风情商业街等等。五至八年后便会建成一个多功能的“世界级文学小镇”，在此你可以处处感触体会林语堂，比如林语堂小时候睡过的木板床，还有林语堂名著场景再造，好像林语堂就在你身边。¹

其实要算林语堂在国内的“故居”，还有一个，已经修缮成文化景点，不过没有挂林语堂的名：重庆北碚的“老舍故居”。这栋房子是1940年抗战时林语堂回到重庆购置的，但林氏在此只是短暂居留，走时留给好友老向（1898—1968）照看，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办公室，后来老舍先生定居其间。重庆市政府将其整修开放，命名为“老舍旧居”。位于重庆北碚区中心地带，闹中取静，一栋中西合璧的小别墅，小花园围绕，为重庆北碚增色不少。也许今后重庆想要争一份林语堂的文化资源，把该处更名为“林语堂老舍旧居”或更恰当。

国内兴建林语堂纪念场馆，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新建的场馆内基本上没什么林语堂生前纪念物什。这有历史原因。首先，林语堂一生迁移不断，可能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最为突出。十岁离开家乡后，林语

1 参见《30亿开掘林语堂故里 重金能造“世界文学小镇”？》，中国新闻网，2012年10月4日。

堂的人生旅途可谓名副其实的全球征途：从坂仔村到厦门（1905年上美国教会学校），到上海（1911年上圣约翰大学），到北京（1916年任清华学校英语教员），到美国（1919年上哈佛大学），到法国再到德国（1923年获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回到北京（1923年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到厦门（1926年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去武汉（1927年参加“大革命”），到上海（1928—1936）；以后三十年，林语堂移居美国和法国（主要居住地分别为纽约和戛纳），而在其人生最后十年（1966—1976），林语堂又移居台湾和香港两地。其次，林语堂晚年移居台湾，去世后其居所改为“林语堂故居”开放，他的手稿、藏书、生前起居物件等都保留在那里。林语堂次女林太乙（1926—2003）在美国去世后，林家又把家藏名贵画卷和书法等（包括林语堂自己的书法、来往书信手迹）一并捐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毕竟纽约才是林语堂一生居住最久之地。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林语堂在国内的声誉大有改善。各家出版社将他的中文著述编了又编，印了又印，书店里往往还有林语堂著作专柜。现在一般公认林语堂为中国现代重要作家，地方政府和发展商也都想开发林语堂遗产的商业价值。然而遗憾的是，对林语堂一生著述的

1 参见 *Straddling East and West: Lin Yutang, a Modern Literatus: The Lin Yutang Family Collec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2007。



作者（右）、蔡佳芳和秦贤次（左）摄于台北林语堂故居，2010年。

评论传记研究还远远不够。¹ 现在林语堂已获认可，被视为现代中国重要作家，其作品可以重印出版，但最好不要讲他的政治主张与实践。因为，要对林语堂一生著述进行全面深入考察和理解，必须修正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有关现代中国的知识结构。也就是说，重新恢复对林语堂的理解恰恰处于反思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的核心地带。

本书是一部叙述林语堂跨文化之旅的智性传记，以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尤其是中美知识交往史为背景。林语堂的跨文化心路历程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化体验的一面镜子，而且和当下中国整个现代旅程息息相关。这部林语堂智性传记旨在为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正本清源添一块砖，或许亦有助于中国和世界重启“新的文明”之探索。

二十一世纪以来，对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的反思已有长足进步。许多既定的观念、虚构的偶像正在摇晃，根基已经不太稳固。这种反思可以从对鲁迅、胡适的评论争论中窥见一斑。鲁迅、胡适当然是现代中国知识界重量级人物，两人和林语堂都很有渊源。对鲁迅和胡适的反思正可以引入我们重审林语堂在现代中国乃至世界知识思想史中的地位与意义。

1 林语堂传记到目前为止比较可读的有林太乙的《林语堂传》（中文）以及苏迪然（Diran John Sohigian）的英文博士论文：《The Life and Times of Lin Yutang》（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1）。改革开放后国内也出版了许多林语堂传记，最有代表性的是万平近的《林语堂评传》。鉴于规范限制或资料不足等各种原因，这些传记对理解林语堂所起的作用仍很有限。拙著 *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1) 并非林语堂传记，而是以林语堂著述为主要案例，围绕中国现代性之自由普世之困进行理论探索。该书所引林语堂著述在本书中已尽量避免，以免重复。

反思鲁迅遗产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知识界对鲁迅的偶像权威挑战不断，争议频频。鲁迅自1936年去世以来，一直被誉为“民族魂”，代表现代中国人的良知。“文革”期间对鲁迅的歌颂近似于个人崇拜，相当“神圣”。尽管如此，改革开放年代，鲁迅研究方兴未艾，鲁迅传记一本接着一本出版，起码有三十多种。¹其中一本传记——林贤治的《人间鲁迅》²重版之际，有学者提出了鲁迅与专制的共谋问题：“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文革中鲁迅是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中惟一个得到肯定的知识分子，这是为什么？鲁迅是最不愿意和官员打交道的，不像胡适那样，还想过去做政府的诤友，鲁迅是最看不惯胡适这一点的。然而奇怪的是鲁迅一直得到官方的首肯，而胡适却从来都是被骂的，为什么新时代愿意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作为自己的旗帜，却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诤友的胡适呢？”³这些问题引出知识界一场辩论：对当下中国来讲，作为知识思想资源，到底是鲁迅还是胡适更合适？

差不多同时，《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给五十六位中青年作家发了一份问卷：“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杂志收到的答案几乎一致为否定，有些公然嘲讽，比如有篇文章题目叫“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年轻作家力争摆脱鲁迅权威的企图昭昭若然。这

1 参见裴毅然《鲁迅问题》，见高旭东编《世纪末的鲁迅论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7页。

2 林贤治：《人间鲁迅》，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3月。

3 谢泳：《鲁迅研究之谜》，见谢泳编《鲁迅还是胡适》，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9页。

些挑战来自较年轻的作家、批评家，另一挑战来自更为有名的文学杂志《收获》（2000年第2期），影响就更大。该专辑发表三篇讨论鲁迅的文章，其中两篇由当代知名作家操笔——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和王朔的《我看鲁迅》，而第三篇更有意思，是篇旧文，六十多年前鲁迅去世不久林语堂写的纪念文《悼鲁迅》。这些挑战在鲁迅研究圈乃至整个学界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¹

这些挑战有三个层面：对鲁迅作品的文学美学价值进行解构式批判，对鲁迅的“国民性”话语进行后殖民式批评，对鲁迅的知识分子立场在道德上、政治上质疑。这些挑战不光涉及鲁迅研究者的职业饭碗问题，更是直接触及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上一些重大问题。需要对鲁迅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进行重新审视与评价，不仅包括胡适，而且我下面要特别指出，也包括林语堂。

重新评价鲁迅其实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了。鉴于“文革”中把鲁迅塑造为“旗手”形象，八十年代鲁迅研究者努力纠偏，尽量拉低其意识形态功能，重新关注其作品美学意义。李欧梵教授的鲁迅研究大受欢迎，学者的兴趣转向鲁迅的个人主义人文关怀、对革命话语的怀疑、精神上的孤独感等。这一转向使鲁迅研究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挂帅中摆脱出来，同时使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权威地位得以延续。不过这种美学转向也为后来更深入的挑战铺平了道路。

如果只在美学意义上欣赏鲁迅作品，那么鲁迅有美学价值的作品

1 有关这些辩论，起码有三本集子已经出版，参见陈漱渝编《鲁迅风波》，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陈漱渝编《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以及高旭东编《世纪末的鲁迅论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10月。

显得相当单薄，分量不够。对解构式批评家而言，鲁迅小说只有少许可视为文学佳作。王朔一向以解构嘲弄作风著称，他对鲁迅的批评还算手下留情，承认鲁迅有些小说写得不错，但他的批评仍很犀利辛辣。鲁迅一直被公认为白话文文学第一人，王朔直指鲁迅的白话文不怎么样，很幼稚不老练。说到鲁迅最有名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王朔认为是一部类型化小说；虽然类型化手法有利于鲁迅要做的“国民性”批判，但就小说美学观来看，类型化手法是失败的。¹而在冯骥才看来，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正是问题所在。冯氏批评从后殖民理论出发，指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自西方传教士的话语。西方传教士首先提出所谓“中国国民性”的命题，以揭示中国人性格的缺陷，以便为在中国传教寻找理据。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正是受到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一书启发，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叮嘱中国人要翻译研读此书。²冯骥才当然明白鲁迅和明恩溥对中国国民性批判的用意不同，但鲁迅没有指出这种国民性批判话语的帝国主义性质，因而对这种东方主义色彩的中国凝视，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如何，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一直被奉为鲁迅最深刻的“思想”，现在亦被揭示为“舶来品”，又如何谈得上“深刻”？³

1 王朔：《我看鲁迅》，见陈漱渝编《鲁迅风波》，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第132—142页。

2 参见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Jing Tsu,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1895-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Qian Suoqiao, *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1。

3 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见陈漱渝编《鲁迅风波》，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第125—131页。

《收获》专辑出版以后，鲁迅故乡绍兴市作协主席朱振国给中国作协发了一封公开信，对该杂志发表这三篇文章表示惊讶和愤怒。朱振国表示，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坛的经典地位早已确定，但按照这三篇文章的说法，鲁迅没什么“伟大”可言，其权威性“早该掣到太平洋里去”。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的标杆当然就撑不住了。¹

当然，鲁迅辩护者多了去了。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朱振国那样，可他们一点都没有让步的意思。对王朔的解构式挑战，他们回应的方式基本上是采取轻蔑的忽视，似乎严肃的鲁迅研究者不应压低自己的身价来理睬这种虚妄的反偶像姿态。或者，有如一位学者指出，用解构策略来挑战鲁迅忘了一个重要历史事实：鲁迅自己就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解构主义者。鲁迅一生都在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铁屋”，而这正是“鲁迅的精神”。“因此，用解构主义来消解鲁迅，不是很可笑吗？”²

我们要鲁迅还是胡适

针对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挑战，辩护者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他们只需强调鲁迅的中国本位立场及其力图改变中国的崇高意愿。可是，有关

- 1 朱振国：《贬损鲁迅，意欲何为》，见陈漱渝编《鲁迅风波》，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第146—150页。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子见南子”事件。1929年，林语堂《子见南子》一剧由曲阜二师进步学生搬上舞台，当地孔门族裔认为有损孔子神圣形象，给教育部写公开信抗议。当年鲁迅和林语堂曾站在同一战线抵抗。参见 Diran John Sohigian, “Confucius and the Lady in Question: Power Politics,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Confucius Saw Nanzi in China in 1929”,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6.1 (January, 2011): 23–43。
- 2 高旭东：《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鲁迅》，见陈漱渝编《鲁迅风波》，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第217页。